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二)

中国航海学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吴幼雄

# 元代泉州两方基督教(景教) 墓碑研究

——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宋代，泉州是东方大海港，特别是元朝达到鼎盛的阶段。宋元时期，基督教除从陆路传入泉州以外，也有随着海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而从海路传入泉州。

基督教何时传入泉州，基督教在泉州的盛况如何？这些问题，中外史料记载甚少，因此，异说纷纭。本文拟对泉州出土的两方古基督教墓碑进行研究，初步回答以上的问题。

今年夏天，在荷兰召开“泉州基督教（景教）”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泉州”冠其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可以说是首次。可见，泉州古基督教在世界各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泉州新近发现的一方古基督教（景教）墓碑，考证南宋时泉州就有基督教的传播。第二部分，是通过泉州出土的“失里门”基督教（景教）主教墓碑的进一步研究，揭示元朝前期泉州基督教（景教）、天主教的盛行。第三部分，结论。第四部分，附录。

最近，有的学者把“失里门”墓碑上的叙利亚文字拼写的突厥语的内容，释读为晋江草庵摩尼教的教主。为了避免误导，也

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除了在专为这次会议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论文集,重新发表20世纪80年代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之外,今次再写文章进行研究,并在《附录》首次发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东京都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寄给郭沫若先生信的全文(此信由郭沫若转寄吴文良,村山七郎亦得拓本),希望将泉州古基督教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今,泉州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遗迹文化,而本文通过两方13—14世纪基督教在泉州的墓碑之研究,揭示东、西方文化在泉州的共存、融合、繁荣和互相吸纳,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普世价值观,正是当今全人类所追求的。

## 一 泉州景炎二年王氏十二小娘立 基督教(景教)墓碑

1994年1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城区发现一方有纪年的古基督教墓碑(属聂思脱里教派,即景教)。墓碑呈尖拱形,辉绿岩雕成,保存完好,碑榫完整。

### 1. 墓碑的介绍

碑高52.5厘米、宽25.5厘米、厚8.5厘米。碑的背面琢平,碑的正面沿碑周缘浮雕1厘米宽的边框。整个碑面分为上、中、下和碑榫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从上而下的高度比例分别为23.5:13, 5:7, 5:8,比例和布局合理,是泉州历来所发现的基督教碑之特出者。

上部:碑面正中浮刻一个尖拱状的龕,龕之上部及左、右,留下5厘米宽的地方,上刻《营造法式》的“海石榴华枝条卷

成”图案。<sup>①</sup> 龕内浮刻直径9厘米的十字架，十字架下刻有云朵承托。

中部：碑面琢平，刻成一个高13.5、宽23厘米的平面长方形框，框内竖阴刻7行汉字，为照顾辈分的关系，碑面文字多挤压于左半部分，从结构布局面角度看，则显得疏密不匀称。碑文内容是：

至元丁丑

郭氏十太孺

故妣二亲

陈氏十太孺

正月日吉

戴舍王氏十二小娘

丙戌仲秋壬申

中部文字内容可分为左、中两个部分。中部为“故妣二亲”郭氏、陈氏合葬时间；左部发为“戴舍王氏十二小娘”重立墓碑的时间。

碑下部：浮刻一条1厘米宽的横线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高7.5厘米的长方形框，框内浮刻卷曲云纹状图案。

碑榫：高8厘米，保存完好。

## 2.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

元朝有前至元和后至元两个年号。前至元，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亦即景定五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64—1294）；后至元即元顺帝的年号（1335—1340）。

前至元有丁丑年，即至元十四年，亦即南宋景炎二年（1277）；前至元也有丙戌年，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但是，

<sup>①</sup> [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卷33，彩画作制度图样，上。

后至元有丁丑年，即后至元三年（1337），而无丙戌年。由此可以推断，本墓碑的年号当属前至元无疑。

### 3. 本碑属二次葬或合葬重立墓碑的问题

本墓碑的碑文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至元丁丑，正月吉日”，是为“故妣二亲”“郭氏”、“陈氏”等两位“十大孺”的合葬时间。宋元时期，泉州盛行二次葬。不久前泉州发现一方尖拱形墓碑，碑首刻“永思”，下刻××××尊神、懿神等5人的姓氏，并有骨灰罐、青铜器、铜钱，这显然是二次葬的墓碑。二碑相比较，我倾向于前碑为合葬重立碑。

其二，“丙戌仲秋壬申”，为“戴舍王氏十二小娘”替其“故妣二亲”合葬重立碑，或二次葬立碑的时间。

### 4. 墓主属宋属元的问题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蒲寿庚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而元军于十二月初八日（1277年1月13日）抵泉州。

《宋史纪事本末》又记，“景炎二年……二月……时北方有警，元主召诸将班师……三月……陈瓚起兵复兴化……七月，张世杰以元军既退，自将淮兵，讨蒲寿庚”<sup>①</sup>。

这就是说，元军自景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1277年1月3日）进入泉州城，到景炎二年二月撤离泉州城，元军进驻泉州城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两个月左右。

而墓主郭氏、陈氏两人合葬的时间是景炎二年正月，时距元军进驻泉州城仅仅一个月左右。假设郭氏、陈氏二位孺人是随元

<sup>①</sup> 《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位。

军进入泉州的随军家属，且她们两人于一个月內先后逝世，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况且，元军因有蒲寿庚、田子真的投降，所以进驻泉州城是没有经过战斗的，这样郭氏、陈氏在一个月內相继去世就更不可能了。按汉人的习惯，是父母辈当中，一人逝后，停柩家里或寺庙，等待数年或数十年后，待另一人死亡，然后一起合葬。这就表明墓主郭氏、陈氏是生活于南宋中后期的泉州基督教徒。

按儒家的礼仪，大夫的妻子称孀人。《礼记》云，“大夫之妻曰孀人”，以表示妻子属于丈夫。又据《铁围山丛谈》载，宋政和中（1111—1118）诏：“改县君号为室人、安人、孀人。”<sup>①</sup>

据以上历史情况和墓碑文内容推断，重立碑（或二次葬立碑）的王氏十二小娘的丈夫姓戴，是泉州地方的士大夫阶层，但在重立墓碑之前已去世。本墓碑是王氏十二小娘在婆婆郭氏、陈氏合葬九年之后重立的墓碑（或二次葬后立碑）。

可以这样认为，生活于南宋中后期的泉州基督教（景教）徒戴家的郭氏、陈氏，于至元丁丑年（1277）正月以前，先后逝世，并于至元丁丑年正月合葬。那时，元军刚刚进入泉州，旋即北撤。7—9月，有张世杰和畚军包围泉州城长达三个月，城外坟地悉遭破坏，而逃入城里的百姓，亦遭“丁丑风尘冒倾洞，全家投城，粒价日穷，死者万计，罄囊莫给”<sup>②</sup>之厄运。迨至后至元丙戌年（1286），戴舍王氏十二小娘才为其“故妣二亲”坟墓重立碑（或二次葬立碑）。

由上史实分析，本墓碑的墓主郭氏、陈氏，系生活于南宋中后期的泉州汉人基督教（景教）徒。这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就

① 蔡條：《铁围山丛谈》卷1。

② 吴家庭：《延陵黄龙吴氏族谱》，黄龙族一世祖礼公旧墓志铭。黄龙吴氏修建委员会，1989年重修。

有基督教的活动，而在这之前，一般学者都认为泉州的基督教(景教)是随蒙古军南下带来的。南宋中后期泉州有汉人基督教(景教)的活动，这与当时泉州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海港的地位是相称的。

### 5. 本墓碑发现的意义

其一，本墓碑是泉州发现的纪年最早的基督教墓碑。过去，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基督教墓碑有1313年的失里门主教墓碑和1306年的吴叻哆呢噠主教墓碑。而本碑的纪年是1277年，为南宋景炎二年。

其二，本墓碑墓主为长江以南福建泉州的汉人基督教徒。碑文内容完全依据儒家的礼仪规定撰写，如立碑者王氏十二小娘，称其婆婆为“故妣二亲”，又写明二亲的辈分是“十太孺”。碑末还点明自己的身份是属于“戴舍”，这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从属丈夫的儒家礼仪。无论从二人合葬之风俗，或碑面行文“故妣二亲”居中，而立碑者小字辈“王氏十二小娘”铭文居左等形式看，均纯粹为儒家礼仪形式。这是迄今可以肯定的南宋中国南方泉州汉人的基督教(景教)墓碑。

其三，本碑证实在南宋中后期，泉州港就有基督教(景教)的流行。学术界一般认为，基督教(景教)势力是随蒙古军自中亚、内蒙和华北等地再度向东南传播，因此，在江苏扬州、福建泉州发现的基督教(景教)徒墓碑的纪年都是在元代。由此，学术界多数人得出结论，泉州发现的许多基督教(景教)徒墓碑的墓主，不是中亚人，就是回鹘人、汪古部人，或蒙古人，就是没有发现福建泉州的当地汉人。所以，他们据此论断，说景教随元军传入泉州，只流行于社会上层(色目人、蒙古人)，因为元朝统治的时间短暂，尚来不及扩展至民间，故元亡基督教随之而消灭。

如今，“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基督教（景教）墓碑的发现，推翻了学术界的结论，表明南宋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方的著名海港——泉州，就有基督教（景教）的传播。

其四，亲人合葬为中国古代的葬俗，二次葬亦为中国的葬俗。“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墓碑，表明是合葬（包括二次葬）“故妣二亲”二位“太孺”，而前文提到的泉州新近发现的一方宋代尖拱型墓碑，则是二次葬3位“懿神”，2位“尊神”。宋元时期，泉州这种合葬现象也在伊斯兰教徒中出现。20世纪60年代，泉州发现一方伊斯兰教徒合葬的墓碑，碑面上部刻“黄公墓，百氏坟”，下部用阿拉伯文刻写合葬的时间为回历700年（大德四年，1300）；碑的背面刻《古兰经》文。这里的“黄公”，当为泉州地方的汉人，“百氏”应为波斯、阿拉伯的妇女。这一方面表明伊斯兰文化已融入泉州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表明泉州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伊斯兰文化，并通过合葬风俗表现出来。

其五，本墓碑的十字架与祖先崇拜的共处，让我们联想起具有海洋心胸的泉州人吸纳外来宗教文化的方式。即早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佛教的“佛”，以善意和慈善为出发点，来理解和吸收外来宗教文化。如公元1306年泉州的基督教主教吴咬哆呢噠碑云：“非佛后身，亦佛弟子”，这里以耶稣称佛；公元1281年，印度教徒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创建温婆神庙，得到御赐执照，湿婆像称“御赐佛像”；泉州晋江草庵的元代明教（摩尼教）徒，为祈祝双亲在天之灵早入明界，称“早生佛地”；泉州宋代的伊斯兰教徒，称呼教徒入寺做礼拜的宣礼塔为“叫佛楼”。如此等等。泉州人这种慈善的胸怀和吸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方式，是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典范。

本碑的“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故妣二亲”基督教（景教）合葬墓碑，是泉州发现的首例古代基督教徒合葬墓碑，



它表明宋代基督教尊重泉州汉人传统的祖先崇拜习俗。它再一次证实,宋代泉州人的海洋心胸、海洋性格,既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但是,又巧妙地把西方基督教文化融入汉文化的礼俗之中,用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先生的话说,是古代泉州人做到“各美其美”又“美其人之美”。宋元时期,泉州地方这种东、西文化的互相尊重,这种多元文化的胸怀,保护了阿拉伯和西方文化“基因的火种”<sup>①</sup>,并巧妙地把它们糅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这是全人类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在今日全人类追求“全球化”的过程中,古代泉州人所表现出来的“普世价值”观,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

## 二 泉州元代帖迷答扫马等立失里门的基督教(景教)墓碑

### 1. 墓碑的描述

碑高 56 厘米、宽 49 厘米、厚 9.5 厘米。辉绿岩琢成。碑顶作尖拱形,尖端部分已被琢去。碑面磨光,碑右阴刻两行直书的聂士脱里叙利亚文字,碑背亦磨光,但不刻文字。这方墓碑石是原填入泉州城墙内,1940 年在泉州通淮门拆卸时由城墙内挖出,以后流散,至 1954 年 12 月才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被发现。它是一方元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一个特设高级僧侣的墓碑石。碑左两行汉字是: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

<sup>①</sup> 引自台湾“中研院”李亦园院士为本次学术会议撰写的论文,题为《释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文化意涵》。

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明教，就是摩尼教。秦教，就是景教，或称聂士脱里教，它是基督教的别派。也里可温则为蒙古人称呼景教和天主教的名称。

## 2. 墓碑研究的介绍

关于这方墓碑，曾有许多学者作过介绍和研究。

1956年，厦门大学庄为玠教授初作介绍，但他的碑文抄本脱落“八”和“哈”两字。<sup>①</sup>

195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L.C. Goodrich 教授，介绍了庄先生的文章，并对此碑加以考释。<sup>②</sup>

1957年，本墓碑的发现、收藏者吴文良先生，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发表本碑的照片、录文和初步考证。<sup>③</sup> 1963年，日本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为进一步研究此碑，致函郭沫若院长，索取本碑拓本。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列于信中。<sup>④</sup> 信内容见附录。

1964年，村山氏把获得的拓片和研究成果，用德文发表于

---

① 《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第46页。

② 《美国东方学会会志》JAOS，第77卷，第3期，1957年，第161—165页。

③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三，泉州摩尼教石刻，图10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 1963年6月10日，日本顺天堂大学、日本语言学会委员村山七郎氏，致郭沫若院长信。信中表示“很希望能够得到并发表图108的拓本”并“愿将所得结论，述之于中国学者”。

《乌拉尔阿尔泰研究年鉴》。<sup>①</sup>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又作综合性的,深入一步的考释。<sup>②</sup>

### 3. 墓碑文字的释读

现综合村山七郎两次对碑文的考释于下。村山氏认为这方碑刻是用叙利亚文字拼写突厥语的。用拉丁字母拼写,大致如下:

mahi-ail-lar-ning mar-i hasya mar-i Šilemun episkupa-ning kabra-si ol (德文版作 qabra-si ol)

ut kui yil sak (i) Z (in) (德文版作 sāk (i) z (n) c ai-ning on bis-ta……yalavac-i ca biti-mis (德文版作 pis-tä baslap keliu Z-uma bitimis).

逐字注释于下:

mahi 推想为叙利亚文的“宗教、信仰”的意思。但在叙利亚文的辞典上得不到证实。(德文)但在原苏联境内七河(Semirijetschie)地区的叙利亚景教墓碑有 malimna 和 malimnatha, 都作“信仰”的意思。

ail-lar 是突厥语“村”的意思。(德文) lar 为多数结尾词,也许是吉利吉斯的“村子”,故大胆假定它为“教区”的意思。

-ning 是突厥语的属格接尾词。(德文) ning 为突厥语名词所有格词尾。

mar-i 的 mar 是叙利亚语的“师、主”的意思,附在后面的-i 为突厥语接尾词。(德文) mar 是叙利亚语的尊称(犹汉语的先

<sup>①</sup> 村山七郎:《泉州出土的突厥语景教墓碑》(德文),载《乌拉尔阿尔泰研究年鉴》35卷,D分册,1964年,第395页。

<sup>②</sup>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生)。i 是突厥语第三身名词的结尾。

hasya 是叙利亚语“僧职人员”的意思。

mar-i 与前面的 mar-i 相同。

Šilemun 是死于泉州的聂思脱里主教的名字。

episkupa = 希腊语的 episkopos “主教” (英语 bishop)。

kabra 是叙利亚语“墓”的意思。(德文) qabra-sī 中 qabra 是叙利亚语“坟墓”。在突厥人看起来, 这个字和 mar 都是外来语。sī 是突厥语所有格的语尾, 相当于汉字的“之”字。是突厥语“所有者的墓界”。

ol 是突厥语的单位, 本来是“那个”的意思。可是在古回语文书中作 copula (……是也)。(德文) ol 原为指示代名词, 但在东突厥语中是作联系词使用。

ut 字, 在セミレチレ发掘的聂士脱里教徒突厥人的墓碑上(叙利亚文突厥语)是“牛”的意思, 按照突厥语的正确语形, 应作 ud。(德文) ut 相当汉字的“丑”, 原意是“牛”。“牛”、“丑”分别是十二生肖和地支的第二位, 所以“癸牛年”即“癸丑岁”。七河地区景教也把 ud 作 ut。

kui 是“癸”的译音。

yil 是突厥语的“年”。

sāk (i) z (in) cai-ning 是突厥语“第八月的”。

on bis-ta 突厥语“在十五(日)”。

yalavac 是突厥语“使者”的意思。

cā 意义不详。

biti-mis 是突厥语“书写”的意思。

根据以上的解释, 知道这是一方用叙利亚文拼写突厥语的碑刻, 大致与汉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汉字的句点应这样标就对了, 即:

也里可温 (érkoun)、马里 (mar-i)、失里门 (Šilemun)、阿

必思古八 (episkupa)、马里哈昔牙 (mar-i hasya)。

译意是：“基督教徒(聂思脱里派教徒)师 Šilemun 主教师僧”的意思。

综上所述，这方碑碣的译文内容是：

(日文)“在公元 1313 年，聂思脱里教主教失里门(セミレチレ)师，死于泉州”。

(德文)“这是僧侣先生教区(?)的教长(主教)失里门先生的坟墓”。

在 12 世纪，突厥语族中的汪古、客烈、乃蛮等三部，早就接受了中亚传入的景教。如以后客烈部的王汗，西方人称为长老约翰<sup>①</sup>。成吉思汗兴起后，征服客烈、乃蛮，蒙古略金地，它们随蒙古军南下，惟汪古归附蒙古，仍保留原民族的特点。汪古部有天德军丰州汪古、净州天山汪古和云中汪古等三部分。它们都使用突厥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艾不盖河、锡拉木伦河等处，发现许多汪古部的景教墓碑铭文，有的是叙利亚语的，有的是借叙利亚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有的在叙利亚语单词后加上突厥语 SY。<sup>②</sup> 本碑的情况恰恰与上述情况相同。景教来源于叙利亚，叙利亚语是景教徒的官方语，因此景教徒丧葬铭文也用叙利亚文书写，但他们不甚精通叙利亚语，所以往往夹杂突厥语法习用的语尾之类。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本碑刻上的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很可能是 14 世纪汪古部人所作。

#### 4. 关于立碑人“扫马”的问题

再从“扫马”名字看，这方失里门墓碑也可能与汪古部有关

① 张星娘译：《马可波罗游记》，第 100 页，1936 年，商务印书馆。

②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的研究》第二卷，第 422、430 页。

系。

扫马(Sauma)不是中国名字,是叙利亚常用聂思脱里派的人名,它的意思是“禁食得子”,表示十分虔诚的意思。13世纪末,有拉班·扫马(Rabhan Suama)<sup>①</sup>,他是有名的聂思脱里基督教徒,生于北京的畏吾儿人。他和马可(Marc)曾于(1287—1288)游历欧洲。<sup>②</sup>这个记载,最先是于1888年以叙利亚语文本在巴黎刊行,1895年由J. B. Chabot译成法文,后J. A. Montgomery与S. W. Budge译成英文。最先叙利亚文本称扫马和马可可是东突厥人。伯希和氏则考证马可是汪古部人。<sup>③</sup>可见扫马名字在东突厥(也即汪古部)人中,是基督教徒的常用名字。

扫马名字,在国内文献上也有记载。在元代,有个很有名的汪古部马氏家族。元好问在为马氏祖先写的《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载:“君讳庆祥,字端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返,勅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凡种人之在藏获者,贯为平民,赐钱币纵遣之。君之祖讳迭木儿越哥,父把骚马。也里黠,又迁净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于殖产为易。君家勤俭,自力耕垦畜牧所人,遂为富

① 明义士:《马可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J. M. Menzies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arco Polos time), 齐大季刊第五期, 第178页, 1934页。

② 明义士:《马可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J. M. Menzies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arco Polos time), 齐大季刊第五期, 第178页, 1934页。

③ 摩尔《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Moule Chir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S. P. C. K, 1930年, 第94页, 注2)。

人。……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sup>①</sup>

另外黄晋《马氏世谱》也有一段重要记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录深思……辽主道宗咸雍间……道宗欲官之，辞不就，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遂家临洮之狄道。和录深思<sup>②</sup>生帖木尔越歌，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惟称之曰马元帅，因以为氏。帖木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伯索麻也里束生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凡诸国语言文字靡不所通。”

以上两段引文，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关于马氏族源和宗教信仰。“花门”，即回鹘。“西域”指西迁后回鹘人住地。可见马氏汪古部为回鹘人，先居临洮狄道，后迁辽东，而后再迁净州天山。他们信仰聂思脱里基督教。

关于汪古部的文字。马氏能“通六国语”，任“译史使者”。当时汪古部使用的文字复杂，比如20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汪古部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墓铭文<sup>③</sup>，和解放后发现的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的题记<sup>④</sup>中就有汉字、八思巴文字、回鹘文字、八思巴字拼写汉语、叙利亚语、叙利亚字拼写突厥语等。远在中国东南部的泉州，近五十多年来，也发现元代聂思脱里基督教徒遗留的墓碑，碑上所刻文字，一如汪古部所在地所发现的。据此，我们推测，元代泉州的景教徒，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汪古部的。

从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名字看。引文中提到的习里吉斯和习礼吉思，是同一个名字的异译音，亦称阔里吉思（英文叫 George

① 元好问：《遗山先生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光绪七年重镌本。

②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

③ 见《华裔学志》第三期，第232—250页，1938年出版和第四期，第305—308页，1939年出版。

④ 见《文物》1977年第5期，第59—60页。

乔治)。而把骚马与伯索麻，也是同名的异译，即 Sauma（扫马），是马庆祥的父亲名字。都是一般景教徒的名字。至于马氏家族如何以马为姓氏，《马氏世谱》所载只可作汪古部汉化的证明，但不能说明马姓的来源。因为姓马是从马习礼吉斯（马庆祥）开始，而不是从其父扫马开始。所以马庆祥的姓马，是宗教原因。

竖立泉州失里门主教墓碑的景教徒也叫扫马。汪古部一些景教徒的名字，与泉州景教徒墓碑上所见的名字一样。因此，我们推断，帖迷答扫马等立的失里门墓碑，是汪古部基督教徒曾来驻泉州的物证。

### 5. 关于基督教徒阔里吉思在泉州任职的问题

元代有蒙古人基督教徒在泉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或任达鲁花赤。据《元史》云，“阔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大德二年（1298），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几……改福建省宣慰使都元帅”。<sup>①</sup>又据《元典章》载，大德三年（1299）完泽丞相奏过，“前福建等处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陈言一件，那里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省交百姓每做佃户不交当杂泛差役”<sup>②</sup>。泉州路惠安县也有达鲁花赤名叫阔里吉思。<sup>③</sup>所谓阔里吉思，如上文所云，即英文的 George，汉语作“乔治”或“佐治”，为一般基督教徒的名字。

《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出身于长老约翰血统的高唐王汪古部人阔里吉思，即为聂思脱里派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

① 《元史》卷 134，列传第 21，阔里吉思。

② 《元典章》卷 25，户部十一，影避，休遮护当差事。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 27，文职官下，惠安县达鲁花赤、县尹。



浑(即也儿可温)。<sup>①</sup>至顺《镇江府志》也有“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sup>②</sup>。按泉州自大德元年至大德六年(1297—1302)为江浙行省和福建平海行中书省的省治。<sup>③</sup>这些回鹘、蒙古的基督教徒在泉州任官,对泉州的基督教(景教)的兴盛必定起积极的影响。

## 6. 关于失里门和帖迷答名字的问题

查《元史同名录》:《元史》名失列门者七,昔列门者二,失烈门、失里门者各三。<sup>④</sup>

本碑刻上的失里门(Slimun),可能是同名的异译,为一般聂思脱里基督教徒的人名。

至顺《镇江府志》里的“失里河”<sup>⑤</sup>(应是失里门之误),是不是本碑的失里门,那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帖迷答(Timothy)是否可认为是大卫(David)的异译问题。1908年,斯坦因曾在敦煌石室获得一卷按叙利亚文格式写的中文赞颂诗。名叫《景教三威蒙度赞》(即今基督教赞美诗《普天颂赞》的第二首),在卷末载列许多基督教的圣者与书籍,其中有“多惠法王”、“多惠圣王经”<sup>⑥</sup>。“多惠”即中文对David的音译,即大卫。

① 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1卷,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至顺《镇江府志》卷14。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26,文职官上,分省。

④ 汪辉祖:《元史同名录》卷26。

⑤ 至顺《镇江府志》卷9,大兴国寺条。

⑥ 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齐大季刊,第五期,第175—176页,1934年。

### 7.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主教于何时的问题

探讨这个问题，对了解泉州景教的发展情况不无帮助。《元典章》载：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篆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sup>①</sup>

此段记载，虽然反映了也里可温教发展之迅速，因此与道教发生争执，但也说明大德八年以前，江南诸路虽然基督教（景教）已兴盛，但是还没有“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主教之设。

### 8. 本墓碑发现的意义

其一，秦教、也里可温等两个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名称同时出现于一方墓碑上，这种现象为历来所仅见。《长安志》和《册府元龟》称基督教寺（景教）为波斯寺，因为认为来自波斯，不知非波斯教。唐天宝以后，称基督教寺（景教）为大秦寺，因知其从罗马帝国（即大秦）传来。至于也里可温，是元代因受希腊语、阿拉伯语的影响，蒙古语称基督教（景教）、天主教为也里可温。本墓碑的发现，表明公元1313年以前，泉州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摩尼教（明教）已经十分盛行，因此，有必要设置“管

<sup>①</sup> 《元典章》卷32。

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宗教大总管驻扎泉州。

其二，泉州基督教（景教）、天主教和摩尼教（明教）在元廷的地位问题。据《元典章》载，也里可温与佛、道一样，从各地寺院住持的长老中，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僧官，并由“从和尚（也里可温教士也称和尚）保举，经有司批准”<sup>①</sup>，正式成为僧官。僧官负责向政府交纳钱粮和铺马费，“为上位祈福祝寿”，并与地方管民官共同处理僧、俗的“田土相争”之事。如发现僧官有“怠慢上头”的，宣政院可以革除其职务。本墓碑这位驻泉州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也里可温失里门，是元廷宣政院崇福司属下的一名高级僧官。他由元廷宣政院直辖派驻东南沿海的泉州港，这表明在公元1313年以前，泉州港的基督教（景教）、天主教和明教（摩尼教）之兴盛，以及元廷对泉州诸多宗教的重视。

其三，公元1313年（皇庆二年），是泉州港基督教（景教）、天主教、明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外来宗教兴盛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有1281年南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建造一座印度教湿婆神庙。1313年，有波斯著名伊斯兰教教长不鲁罕丁随商舶航海来泉州，住持泉州通淮街清真寺，他的儿子夏敕继其业。他们俩人都活了一百多岁，直至明初仍然由夏敕住持清净寺。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方面，有大德二年（1297）阔里吉思任福建省平章政事。有大德三年（1298），元廷派泉州基督教徒（姓名无考）为使节，“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至波斯后，“哈赞大王特赐七宝体货物呈献朝廷”。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1304）”。

<sup>①</sup> 《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

十……”<sup>①</sup>（碑文残缺）；有大德十年（1306），在泉州的“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唆哆呢噠”；还有1313年，从海路传入的天主教已十分兴盛，驻北京的天主教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经罗巴教皇批准，在福建的泉州港新成立一个主教区，由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而且很快发展到创建三座天主教堂。以及本墓碑所表明的元廷派驻泉州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宗教大总管驻泉州港。如此等等，可见1313年是泉州港诸多外来宗教兴盛的里程碑。

其四，由本墓碑铭文引发出来的元代蒙古人、回鹘人的基督教（景教）徒到泉州任官的问题。这让我们联想到公元1281年，泉州行省平章政事是伊斯兰教徒蒲寿庚；同年，泉州港的港主是印度教徒挹伯鲁马尔；大德元年（1297），江浙行省（省治泉州）平章政事是伊斯兰教徒赛典赤·异密·乌马儿；大德二年（1298），福建行省（省治泉州）平章政事是基督教（景教）徒阔里吉思；至正九年（1349）泉州达鲁花赤楔玉立，是畏吾儿人，出身摩尼教世家。这些外国的或本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徒官员在泉州任官职，对该宗教在泉州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无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宗教徒官员，他们对待异教、异族的文化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容纳、接受和保护的态度。因此，可以说元代驻泉州这些高级行政官员的思想是比较开明的。正因为有他们比较开放的“普世价值”观念，也才有我们今天引以自豪的——泉州是世界宗教文化的博物馆。

<sup>①</sup>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五、附录，P.5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第一部分研究宋代基督教徒“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其“故妣二亲”所立的墓碑,既揭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崇拜祖先礼俗的尊重;同时也揭示具有海洋心胸的泉州人,对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吸纳,并巧妙地把它融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十字架和祖先崇拜的中西合璧的形式,同时并存于一方墓碑之中。这表明宋元时期泉州人的普世价值观念,是人类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本文第二部分,研究元代基督教徒“帖迷答扫马等”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元廷高级僧官失里门立的墓碑。墓碑铭文表明元朝前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在泉州的和平共处,也反映了元代泉州基督教、天主教和明教(摩民教)的兴盛。

从墓碑铭文的研究,又引申出元代泉州有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和摩尼教世家出身的官员,在泉州担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和达鲁花赤。他们对泉州各门外来宗教均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又如佛教徒、畏吾儿人、福建行省左丞亦黑迷失,奉使八罗宇国,带回基督教传教士和圣油(耶稣墓前的灯油),在征瓜哇失败后,又刻立佛教的《一百大寺看经纪念碑》;出身摩尼教世家、畏吾儿人、泉州达鲁花赤楔玉立倡修伊斯兰教清真寺,如此等等。

因此,13—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港与它在经济上成为东方第一大海港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宗教文化的辐射点。泉州既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的楷模,也是世界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这两方古基督教墓碑,“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和文化传

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sup>①</sup>。泉州这种普世价值观的典范，正是当今全人类所追求的，也是这次泉州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时，特别要申明的。

#### 四 附录

郭沫若先生：

向未职荆，而贸然致函于先生左右，深为失礼，诸祈谅解。鄙人在日本顺天堂大学教语言及德语；并在教育大学教俄语，是专攻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现任日本语言学会委员。

今次去函动机，是由于读吴文良氏编《泉州宗教石刻》所引起的：对其中所著录的一件碑文，研究之后，深感兴趣。愿将所得结论，述之于中国学者。

在吴氏这本极为重要的文献中所发表的图版 108，为汉文两行、叙利亚文两行所构成。

汉文的内容，吴氏在第 46 页上读为（句点也是按照吴氏的标法）：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很遗憾，这个句读是不正确的。原碑文上并没有句点。

例如按照下面的读法，就对了。

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这就是 èrkoun mar-i Šilemun episkupa mar-i hasya 的译音是：“基督教徒（聂思脱里派教徒）师 Šilemun 主教师僧”的意思。

<sup>①</sup> 《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关材料汇编》，福建省泉州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办公室编。

我对于用叙利亚文所写的文书，仔细研究了以后，知道是用突厥语写的。用叙利亚文所写的突厥语，也还有一些地方不甚清楚。大致之于下。

mahi ail-ning mar-i hasya mar-i Šilemun episkupa-ning kabra-si ol. ut kui yil sak (i) z (in) c ai-ning on bis-ta……yalavac-i ea biti-mis.

mahi 推想为叙利亚文的“宗教、信仰”的意思，但在历来叙利亚语的词典上，得不到证实。ail-lar 是突厥语“村”的意思。

ning 是突厥语的属格接属词。mar-i 的 mar 是叙利亚语的“师、主”的意思。

附在后面的-i 因为在他的前面有 mahi ail-lar 应该是突厥语的接尾词。hasya 是叙利亚语“僧职人员”的意思。

mar-i 与前面的 mar-i 相同。Šilemun 是死于泉州的 (A、D、1313) 聂士脱里主教的名字。episkupa = 希腊语的 episkopos “主教”(英语 bishop)。kabra 是叙利亚语“墓”的意思。

ol 是突厥语的单位，本来是“那个”的意思，可是在古回语文书当中作 eopula (“……是也”)。

ut 字，在セミレチレ发掘的聂士脱里教徒突厥人的墓碑上(叙利亚文突厥语)是“牛”的意思。按照突厥语的正确语形，应该作 ud。

kui 是癸的译音。

yil 是突厥语的“年”。

sak (i) z (in) c ai-ning, “第8月的”(突厥语)。

on bis-ta “在十五(日)”(突厥语)。

yalavac-i 是突厥语“使者”的意思。

ca 意义不详。

biti-mis 是突厥语“书写”的意思。

叙利亚文突厥语的碑文，大致上汉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根据我于上述的解释，碑文的内容为：在公元 1313 年，聂士脱里教主教西雷蒙（セミレチレ）师，死于泉州。

图 110，吴文良氏认为是“摩尼教碑石”；毫无疑问，这应是景教墓碑石。吴氏文中云幡幢上有：

“大德黄公年玖参岁”（P47）八个字。按“大德”是 episkupa 的译文，其本意为聂士脱里教的主教。按照蒙古人的发音是将 Silemun 念作 Siremu 的，在（华夷译语）上是这样标明的。蒙古语中的 Sira 是“黄”的意思，推想因此之故，称 Silemun 主教为“大德黄公”。假如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在皇庆二年（1313）死去了的 93 岁的西雷蒙（Silemun），应该是公元 1220 年诞生的。

吴文良氏引用了《至顺镇江府志》。其中所引的“马里哈昔牙麻儿失里河必思忽八”，我怀疑很可能是“马里哈昔牙麻儿失里门（mar hasya mar Silenun）阿必思忽八”的讹误。又吴氏引文用的太子也里那延，原文为也可那延，蒙古语中的 yeke noyan 是“大官人”。

吴文良氏在文中的这些讹误之处，若和其出版这一重要文献的伟大贡献来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由于这一著作的发表，使我才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在中国宗教史的研究上，也是必有其一定的贡献的。

若是能够办得到的话，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并发表图 108 的拓本。

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拟在 Ural-Aitaische Jahrbucher 上面发表（已将原稿送交该杂志的编辑部），我想，这对于中国学者，也会是有用的。谨此奉闻。

在百灵庙附近，从部族遗迹中所发现的十字墓石，其上有用叙利亚文突厥语所写碑文，我已将考释的结果，在 1963 年 6 月



7号在东京举行的第8回国际东洋学者会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也预定在 ural-Altaiische Jahrbucher 上发表 (Martin 江上波夫蒐集)。很愿意知道，中国方面对这一资料，有什么成果与作品。

以上，拉杂书此，读起来难免有费解之处。一个从未曾见过先生的人，写了这样一封潦草的信，自觉非常失礼，谨祈谅解，顺祝健康。

村山七郎谨启

东京都世田谷区北泽 5—811